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 11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1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1)
刘湘、刘文辉混战始末	黄应乾(51)
田頌尧、刘文辉成都巷战记	何煜荣(65)
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	陈光藻(74)
二刘大战二三事	杨学端(83)
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 剿匪总司令”的内幕	曾扩情(93)
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经过	邓汉祥(103)
川康整军会议的形形色色	甘绩丕(114)
抗战初期蒋介石侍从室对四川军阀的 调查材料	秋宗鼎(119)
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	伍培英(124)
蒋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	米庆云(137)
西康鸦片流毒造成荣经事变的经过	陈耀伦(154)
四川自流井盐税的掠夺战	杜凌云 彭惠中(165)
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	黄瑾莹(180)
杨氏家族与聚兴诚银行	李维城 宫廷璋(199)

我经营重庆复兴面粉厂的回忆 鲜伯良(231)

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的经过 王世均(249)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

此文所述，是我从 1929 年开始反蒋起至 1949 年起义止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史实。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二十年，我所经历的事情本来是不不少的，但因历年所存资料于成都解放前夕全为胡宗南部所毁，而当年经办其事的几个朋友又皆去世，故不可能全部搜集写出。这里所写的，只是脑中记忆的片断。在整理过程中，虽然曾向有关朋友广事征询，加以补充校正，仍觉不够完整和具体，有的可能还不够准确，希望当年同道的朋友予以指正！

我走到人民阵营经历的道路，是由反蒋而亲共，由亲共而起义。我在这条道路上，前后走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我在政治上由假到真、由黑暗到光明的发展过程。现在，把我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扼要加以叙述，以供现代史料工作者的参考。

一 从反蒋斗争谈起

我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说实话，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 1930 年以前，蒋介石还在军阀混战中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蒋，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1930 年以后，蒋的法西斯统治已在全国确立，并逐

步把魔掌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渐转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失败、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此后的反蒋，则是为了保持残存的地盘，以便重整旗鼓，再图发展。

我过去的政治支配欲所以如此强烈，这也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1916年我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四川搞军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仅十来年的光景，便由上尉参谋升到军长。旧中国是枪杆支配政权的。我手中掌握了一支武力，于是四川省主席也、川康边防总指挥也、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一齐送上了门，俨然成为川康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旧中国的军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会例外。我懂得武力是扩大个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资本，故升至旅长时即开始大力扩军。而扩军又是和内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打一次内战就要扩编一次队伍。川军刘禹九、杨春芳等部几万人，就是在战场上经过较量后被我编并的。曾经有一个时期，被编并的队伍比我的基本队伍还多，形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要经过整理训练，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加以改造。我办有各级军事学校，从军士而尉官、校官以至将官都须参加受训；从而他们同我的关系，既是长官与部属，又是老师与学生。同时我对人事任免权抓得很紧，自连级以上军官都是由我亲自选拔。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使所有部属都死心塌地为我个人效忠。军队光是有人不行，还得把它装备好。我是从两个方面去解决的：一是花钱向外国购买；一是自办兵工工业。为了大量制造武器，开矿山、办工厂、组织技术力量，曾经费了很大的事。我从小就从线装书上知道“为政在人”这一条，所以付出很大精力去罗致人材；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扩大防区。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

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每打一次内战即扩大一次防区。在退守西康之前，据有川西、川南全部和川东、川北的一部。在自己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这是题中应有之文。而盛产盐糖的五通桥、自流井和资中、内江等地又都在我的防区内，盐糖税收为我和刘湘所瓜分。因此，搜刮的财富也较其他四川军人为多。但是我的政治局面日益扩大，支出日益增多，仍然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又开银行，办实业，进一步扩大剥削，去填补财政上的无底洞。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那已经是穷极无聊了。

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少年得志，不可一世。我后来曾用三句成语来描绘当时的心情：“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因此，我那时的主意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去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贵州，为控制西南莫立基础。但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终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围内扩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利用和支持下，互争政权、大起内讧，不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绝地。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被压迫的人民是投入革命，从革命斗争中去求得自己的解

放；而我呢，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讧，从内讧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群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这次反蒋，是承桂系和冯系西北军反蒋失利之后而发动的。蒋在军事上本来占上风，同时我们事前的组织工作又没有作得到家。因此，战争爆发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态度不明，阎锡山的晋绥军按兵不动，两湖同情我们的军人又中途被蒋介石收买，而我的部队又远在四川，一时出不来，以致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陷于孤军作战，不到一个月功夫就告失败了。这个时候，我同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但因蒋正忙于对付阎、冯，无力西顾，而我亦因向中原初试锋芒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也就都暂时不了了之。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爆发了中原大战，7月汪精卫北上，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阎冯桂合作组织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唱对台戏。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决不能放过。因此，当阎冯桂酝酿讨蒋向我征求意见时，即极表赞成；并暗中积极准备出兵进攻武汉，以配合阎冯联军的中原大会战。不过鉴于前一次反蒋失败的教训，火色不能不看老一点，所以直到扩大会议举行的前三天，即9月6日才发出鱼电公开反蒋。我满以为这一下蒋介石一定会被打下去。谁知斜刺里杀出了一个李逵来，张学良忽然改变骑墙态度，倒向蒋介石一边，率领奉军入关；因而扩大会议一哄而散，这次反蒋又以失败而告终。

1930年扩大会议的天折，是国民党内部反蒋斗争的最后一次失败。从此以后，蒋介石成了中国的大独裁者。我曾有过两度反蒋的历史，同蒋已经是冰炭水火，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向蒋介石投降，作他的驯服工具；二是脱离政治生活，到外国去作寓公；三是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前两条道路，同我这样一个人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不愿意走。事实上要走也是走不

通的。因为蒋介石向来欺软怕硬，你有本事整他，他便将就你；你若退让，他就叫你活不下去。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有走最后一条路，同蒋介石斗争到底。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坚持反蒋斗争的原因。

二 走亲共的道路

反蒋失败，转而亲共，亲共之后，继续反蒋。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前已言之，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蒋的势力已经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同时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终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阵营。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1938年，即抗日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现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道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

主义者通过希特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时候，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都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1939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军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们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他们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重大影响的。

1942年2月，我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第一次见面。这次会晤，事前是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的。为了避开蒋介石特务的耳目，时间在深夜，地点在重庆机房街吴宅，在座只有周和我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周马上走了。周在谈话中给我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说：“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最后他还给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说“团结就是力量，须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团结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以上是引述周谈话大意）周的这一番话，使我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经过这次

会晤以后，我同党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我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这个电台的设置，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我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故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我直接联系，如我离开雅安时则指定我的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觉察。他们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侦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没收；并警告蒋介石派在二十四军军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训处主任丁国保说：“现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们由于没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没有在这上面捣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经历将近八年而没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1943年11月和1944年6、7月间，我曾派代表杨家桢到重庆和王若飞先后有过两次会晤。在那些年月里，正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向我节节进逼的时候，不是以对藏用兵为名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就是要派伪中央军进驻西康来控制我的行动，我一年到头都在紧张中过日子。王若飞通过我的代表每次都给我分析了情况，出了主意。他告诉我，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干，我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他一再给我打气，叫我不松劲。我听了朋友的话，坚持了反蒋斗争，终于一个个的难关被

克服下去了。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

1945年2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党派他帮助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1946年2、3月间，正值旧政协会议闭会后不久，周恩来将要离开重庆去南京的时候，他嘱民盟的朋友转达我：“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叫民盟这位朋友特别提醒我，说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他鼓励我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体会到：周的这一番话，不仅是向我说明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时也给个人指明了政治前途。

在这些年月里，我在政治生活中经历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如上所述，共产党主动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怀我，热情地支持我；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反动集团则视我若眼中钉，不断地在政治上排斥我，在军事上压迫我，必欲去之而后甘心。这种切身经历驱使我，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近，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则越来越乖离了。

三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我走上亲共的道路以后，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孤立的感觉，因而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勇气也就更增加了。1938年夏季，我的代表曾庶凡从汉口回成都告诉我：“武汉守不住，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我认为，蒋的大队人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们则与蒋的利害恰相

反，必须保持自己力量，继续控制川康地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也才有条件拥护共产党抗日；所以非拼命不可。这就使得我们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场斗争，应该怎么办？这是我朝夕困心衡虑的问题。我知道蒋介石消灭地方力量的办法，向来是各个击破，我们要对付他，就必须团结西南地区同蒋对立的实力派，共同行动，互相支援，才有办法。同时中共的领导人也一再告诉我，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团结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成为我们反蒋斗争的重要关键。当时贵州省的地方势力已被蒋整垮，该省几乎完全为蒋系势力所控制，工作无从下手；西康省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如何巩固内部而已。因此，团结工作的重点在于川、滇两省，其中四川尤为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四川是西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和西康的门户，同时又是我出生和发迹的地方，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较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人在西康，而心实未尝一日忘情于此。现在，四川已成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彼此都是势所必争。而当时川省内部情况又非常复杂，事情很不好办。根据我当时的分析，四川军政界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属于顽固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人民，死心塌地为蒋王朝效忠的；二是属于中和派，他们既想做蒋介石的官而又怕蒋把他们的力量吃掉，既反共而又不为己甚，在政治上总是踟蹰瞻顾，依违于拥蒋和反蒋之间；三是属于元老派，他们多年在野，大多习于明哲保身，意态消沉，与现实政治生活几乎脱节，但在地方上还有一些偶象作用；四是属于高干派，他们是四川军政界的高级干部，在地方上的发言权虽不大，但是对一些地方首脑人物却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能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头一派是斗争的对象，后三派是联合的对象。根据这个分析和长期的体察，我觉得四川地方实力派中的邓锡侯、潘文华是应当合作，也是可能合作的。尽管我和他们之间对政治上的看法各有不同，对四川地方的权利之争也互

有矛盾,但是大家都想保持四川地盘和自己实力,不愿意被蒋吃掉,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所以我们三人在反蒋斗争上是长期合作的。当然,由于个人利害上的冲突,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时也是同床异梦,互相倾轧,但是涉及到共同的利害问题,又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了。从1938年拒绝张群作四川省主席的事件起到解放前彭县起义止,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反蒋斗争,我始终是联合他们在一起来进行的。

在团结西南实力派的活动中,我所注意的另一个重点是云南。因为云南在地理上与川康接壤,而龙云在政治上的处境又和我大体相似,所以我特别重视同龙的合作。本来,我同龙过去的关系是不够好的,如1929年我支持胡若愚打回昆明,就是去拆龙云的台的。为此,多年来彼此都耿耿在心。但是蒋介石的压迫,却给我们勾销了夙怨,成为反蒋斗争的同路人。1938年6、7月间,龙云到汉口去晤蒋介石,来去都在成都路过,我和邓锡侯、潘文华等趁机同龙商讨了川滇康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大家意见一致,还签订了一个协定,内容大要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行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龙、邓、潘和我都在协定上签了字。在签订这个协定的过程中,因王缙绪一度参与商议,不久他就向蒋介石告密,蒋曾电龙警告,不要他干与川康事。但是龙还是坚守约言,未为所动。为了保持机密,以后即同我单独联系。龙曾派他的总参议李雁宾到雅安同我商讨具体合作办法。当时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因我先同共产党有联系,政治上由我负责,军事上则因龙拥有较大的优势,由他负责。同时还由龙和我投资筹设正成商行,想通过这个企业来实现经济上的合作(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人事安排不善未搞成功)。共产党对我和龙云的合作很关怀,华岗曾由昆明到雅安住了一个时期,同我几度长谈,主要就是为了密切我和龙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我同龙一直是紧密合作的。记得

1944年冬季日本侵略军一度打到贵州独山，整个西南为之震动，龙曾来电征询我的意见，我即约集“唯民社”（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组织的秘密政治团体，详第四节）的一些朋友研究了一番，答复龙：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决不能有任何动摇。龙云复电表示同意，并各自在滇康两省作了一些动员抗战的准备工作。到1945年10月，龙云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离开云南被软禁起来，我们的合作关系才被迫中止了。蒋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前一天，悄悄地来到了西昌。接着就给我打来了一个电报，说什么“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羨”等等，一派鬼话。这样突如其来，我以为他要在西康搞什么名堂了。到10月3日深夜，王少春跑来告诉我，说刚从电台收到消息，蒋介石已命杜聿明在昆明出动武力解决了龙云。这时我才知道蒋来此的企图：一来是便于就近指挥昆明军事解决龙云；二来是给我颜色看，怕我对昆明事变表示声援。他向我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则等于警告我：“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此后我对蒋的警惕就更加提高了。

西南实力派的团结，为反蒋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同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随之而长期化和尖锐化，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年到头几无宁日。现在，仅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蒋介石反动集团斗争的重要事实略举如下：

对张群的拒绝和利用 1938年春刘湘病故，蒋介石认为是拿四川的大好机会，便马上向我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二是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这是抗日战争发生后蒋阴谋控制川康的首次尝试。消息传来，引起了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级幕僚张斯可立即找我驻蓉代表段升阶，要我快从雅安到成都来筹商对策。时邓锡侯尚在前线抗战，我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没有我们的话说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计到，正

在全民抗战期间，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们一致反对，他就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主川政。在我们的坚决反对下，蒋被迫改变了主意，向我们讨价还价：一面答应保留绥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人员的条件下，派张群独自一人来接省主席。我们认为这是诱鱼上钩，只要张一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所以还是不让步。蒋见计不得售，便自我转圜，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一人暂代省主席，才了此一桩公案。1939年，蒋又旧事重提，要张群继王缙绪为四川省主席，我们再给顶回去，蒋无可如何，只好亲自来兼领，而由贺国光以省府秘书长身份代行其职权。这样又闹了一年多，中间经过许多周折，到1940年冬张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张群本来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听命于蒋，始终为蒋效忠。但因鉴于川康地方力量不好对付，如果操之过急即可发生事变，于蒋于他本人均属不利。同时他和CC、复兴为了争权夺利，一向积不相能，又要倚川康地方力量以自重，所以他对我们不能不敷衍几分。我们就抓住他的这种矛盾，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对张群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即：在他未来之前是坚决拒绝，既来之后则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之中，彼此间的斗争也是极其尖锐和复杂的。张群一贯施展其纵横捭阖的伎俩，在川康实力派中进行离间分化，无孔不入，能整则整，企图尽量削弱地方力量，来为蒋控制川康的局面。我们对付张群的办法是：一面防止他的阴谋，在无关大体的事情上可以适当让步，如果涉及川康地方全局和自身政治得失的问题即坚决拒绝，绝不上他的当；一面利用他的关系，在我们和蒋的对立状态中起一些缓冲乃至掩护的作用，来保持我们在川康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力。张群之为，人是诡计多端很够对付的。他同我们进行斗争时，往往是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当形势于蒋有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强硬，各种名堂都来了。反之，蒋若处于逆境，他又以温和的姿态出现，向我们表示妥协。我们同